

国外辛亥革命史研究动态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
中南地区辛亥革命史研究会 编
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



目 录

论文选译

- 孙文与“满洲问题”……………藤井 三 (1)
- 试论孙文的经济思想……………中村哲夫 (14)
- 近代中国的商会……………夏洛·加俐特 (31)
- 村田省藏与孙文……………佐藤武英 (46)
- 张謇国际学术研讨会与日本的张謇研究
……………野泽丰 (50)
- 1904—1914年的上海市政机构……………马克·埃文 (61)
- 中国的现代化:绪论……………基尔伯特·茨诺曼 (76)
- 孙文在1900年
——关于两广独立计划……………上村希美雄 (99)

书评·读书札记

- 读冈斗基等著《中国国民革命的分析研究》
……………笠原十九司 (125)
- ✓评斯各珀著《中国的社会名流与政治变迁：
二十世纪初的浙江》……………罗斯基 (143)
- 齐赫文斯基新著论孙中山政治观点和实践的进化
……………严昌洪 (146)
- 《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中文版序言
……………白吉尔 (149)

史料史迹介绍

- 辛亥革命在汉口……………苏古敦(153)
《中国评论》与第二次广东政府和孙文
……………藤井升三(172)

学术动态

- 孙中山的“中日合作论”……………松本英纪(177)
“五四运动研究学术讨论会”召开始末记
……………横山宏幸(197)
1980年—1984年美国关于国民党统治时期历史研
究的博士论文一览……………(201)
法国近、现代中国研究论著及机构概览……………(205)

学术往来

- “对外经济关系与中国近代化国际学术研讨会”
参加记……………久保亨(210)
“民国档案与中华民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
介绍(之一)……………(219)

海外研究者介绍

- 岛田虔次……………赵军(221)
美籍华裔学者郝延平教授……………张富强(226)

“孙文与满洲”问题

〔日本〕电气通信大学教授 藤井升三

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中叶的日中关系史中，日本对于中国的东北即所谓“满洲”一直怀有政治的、经济的以及军事的野心，九·一八“满洲事变”之后公然对该地实行军事侵略，建立傀儡国家“满洲国”。一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为止，“满洲”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残暴的侵略活动中最主要的被侵略对象。

但是，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者——孙文是怎样看待日中关系中的“满洲”问题的呢？孙文对于“满洲”问题的态度，在中国革命的进行过程中产生过怎样的变化呢？它与孙文的反帝活动又有什么关系？本文拟就这些问题作些探讨。

1964年，我曾在《国际政治》第二十六号上，发表过题为《孙文与“满蒙”问题》⁽¹⁾的论文。由于当时有关资料十分贫乏（即便是现在，材料也很难说已经足够了），所以这篇论文有一些不恰当的表述和不正确的提法，现在有必要将它们重新提出来加以订正。

第一个需要订正的地方是：

“日本非常流行这样一种说法：孙文过去曾多次赞同将‘满蒙’给与日本（许多人由此认为孙文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态度是非常妥协的）。这种说法的流行，大概一是由于一些载有这些内容的历史记载的传播，如《东亚先觉志士记传》等，二是由于一些侵略主义的大亚洲主义者们对建立‘满洲

国’充满幻想，希望中国革命家孙文也存在这种思想，并将其与孙文其他类似肯定（日本在‘满蒙’权力的）言论、精神联系起来而想像出来”（2）。

对于这段话，现在我想订正如下：

“不只是《东亚先觉志士记传》等书的传说，根据最近所发现的可靠性更高的资料，可以肯定，孙文在革命运动的早期，在‘满洲’问题上对日本确实采取了妥协的态度。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孙文对于‘满洲’问题的态度，又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第二个需要订正的地方是：

“二次革命期间，据说三井（公司）的森恪，曾经得到元老桂太郎的承诺，向孙文提出下述提案：日本向军事上、财政上处于劣势的革命军提供装备两个师团的武器和二千万日元的现金，作为换取革命政府将‘满洲’割让给日本的条件。日本方面的所谓‘收买满洲计划’正式开始实行。……‘收买满洲计划’结果未能实现”（3）。

这个地方，主要是依据山浦贯一所著的《森恪》一书来叙述的，但现在已有查明，《森恪》（4）的记载与历史事实多有出入，所以本文打算依据后面将要提到的森恪致益田孝书简，做些订正。

一、从革命运动早期到辛亥革命

1895年发动的第一次武装起义计划败露、受挫之后，孙文就亡命日本，而后又遍游欧美，于1897年再度抵日。此后一直到1903年，他都居住在日本进行革命活动。

1898年，孙文在东京初次见到了当时正在鼓动对俄开战

舆论的大陆浪人内田良平。那时，在中国革命的必要性和日俄开战的必要性问题上，曾说过下面一段话：“支那革命虽有必要，但支那革命之先尚有先决问题，即日俄之开战。日俄不战，无以挫俄国东侵之势力；而俄国东侵势力不挫，（彼）即有乘革命变乱侵略支那领土之虞。殷鉴不远，请看日清（甲午）战争之结果。再上溯至英法联军攻陷北京之时，俄国岂非迫中国割让乌苏里一带之土地耶？”（5）

对此，孙文的回答是：

“支那革命倘若成功，收复俄国侵占之地并非难事，不足为虑，何况尚有日支提携（可以凭靠）耶！”（6）对于当时的中国，革命成功是优先于任何问题的先决问题，即便是一部分领土被俄国夺走，只要革命派掌握了政权，再加上与日本的提携合作，收复失去的领土就是不难办到的事情。这就是孙文当时对于领土问题的考虑。这里反映出了孙文对于中国革命成功的强烈的自信，再广而言之，也反映了孙文认为中国革命成功，清朝政府被打倒，革命派夺取政权之后，有可能解决包括领土问题在内的一切不平等条约问题，恢复国家的主权。这是一种极其乐观的外交观。这种乐观的外交观和对中国革命成功的强烈自信，后来长期存在于孙文的思想中，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年，清政府由于对义和团事件所采取的对策，日益失去了对内对外的威信，而另一方面革命派却由于1905年在东京实现了三派的联合，成立了统一的革命组织中国同盟会。同盟会发动的历次武装起义虽然相继失败，但国内的政治状况却朝着有利于革命派的方向不断发展。

1907年2月13日，内田良平与“韩国统监”伊藤博文会谈，伊藤告诉内田，清朝的庆亲王来了密函，要求将孙文驱

逐出日本。对此，内田回答说：“孙文自前年以来，即向我朝野人士游说，谓日本若能援助支那革命，当以满蒙让予日本，恐其情报已达北京，故庆亲王有此书以致阁下也。”（7）

后来，1911年7月16日，孙文在致宗方小太郎的书简中，又谈到了“满洲”问题：

“弟之视日本，无异第二之母邦，独惜近日吾国少年志士，每多误会贵国之经营满洲为不利于支那，此种輿情殊非将来两国之福也。弟每辩解，莫释疑团。”（8）

这封书简中，孙文明确肯定了日本对“满洲”的“经营”已是确定无疑的了，但问题是孙文所说的“经营”的内容，是指获得完全的主权呢，还是指租借权呢或是指别的什么意思呢，他自己也没有明确地加以说明。

孙文正面谈论“满洲”问题，是在辛亥革命中的1912年初。

1911年10月10日发生的武昌起义扩大到全国以后，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诞生了新政权中华民国。但孙文等的南京临时政府，由于财政窘迫和内部矛盾，实行北伐最后推翻清政府的事业面临重重困难，结果不得不举行南北和谈以谋求妥协解决。

1912年2月3日，孙文与访问南京的三井物产（公司）职员森恪就租借“满洲”问题进行了协商，参加协商的，除了孙文和森恪之外，还有总统府秘书长胡汉民，他代表因病不能出席的黄兴，森恪方面请了宫崎滔天和山田纯三郎参加，以为后日的见证人，目的是为了防止将来孙文的反悔。

会谈的基本原则，已由三井物产顾问益田孝根据元老桂太郎的意见以命令形式下达给了森恪，这就是森恪向孙文提出的租借“满洲”方案，其内容大致如下：

“保全满洲”对于日本的安全和东洋的和平来说都是必

要的。但是，南京临时政府以自己单独的力量无法实现“保全满洲”，如果将“满洲”让给日本全权处置，作为回报，日本也可以提供“特殊之援助”。（革命政府）如有坚决实行此计划之意思，孙文、黄兴两人中不拘是谁，请来一人至日本与桂公会谈。日本方面拟派军舰来迎接，送到九州三池煤矿后再换乘专列赴京都，桂公将从东京赶赴京都与孙文会谈⁽⁹⁾。

对于森格的提案，孙文用下面一大段话表示了基本承诺的态度：

“（前略）桂公既有这般决心，自己多年来为支那，为黄色人种亦不胜焦虑。为东洋和平考虑，满洲固然须始终保留于东洋人手中自不待言，故当此次举事之初，余等曾乞于日本，将满洲一任日本处置以交换对我革命之援助，余为此事申请赴日，不意竟遭日本官宪之拒绝。……（中略）最近革命政府财政匮乏已达其极，供应军队之财源早已断绝，几临破产之边缘，万一此数日中无法筹足解救燃眉之急之资金，军队只得解散，革命政府恐亦难免瓦解之命运也。……（中略）军队之困穷日甚一日，倘于军队解散、革命政府瓦解之前，与袁世凯等缔结和议，抑制天下之大乱，而后徐图军费之筹措，举兵再起，以武力一扫北京方面（力量），仍可革新天下也。近来与北方频频接触，欲取得和议之达成，即基于此方针也。……（中略）余等今日于重开财源之事，仍存一缕之望。倘能幸于此际，获得足以防止军队离散之资金，余等即可将对袁和谈延至年后，而后再筹资金，力排袁氏，按原定计划以武力横扫南北之异分子，断绝他日内乱之根，建设完全共和之政体。然虽有此种考虑，百方筹措，至今仍无望筹足所需经费，若今后五日内即6日之前或至晚旧

历年末（那一年的旧历年末为2月17日——原注）前仍无筹得（日本）已允诺一千五百日元资金之希望，则万事休矣。革命政府在将倒之前将先发制人达成南北和议，将政权交付袁世凯。而袁氏一旦握有权柄，今后会有何事发生则不可逆料，余等与日本之密约亦无望付诸实行也。……（中略）机会将逸，万一桂公已明瞭余等之心迹，信任余等，有为日本断然实行其志之意，望先考虑至急提供现金事，以防革命军队之离散，余等今日手中须得有钱方能获军伍之信任，军心稳固才能如（桂公）所愿望者行事。余与黄兴不拘何人当可去一人东渡日本，与桂公相见以定满洲问题与革命政府前途之大计，此亦早为余等办事之方针，而今若有机会，此亦乃须立即着手处置之先决问题也。”^{（10）}

孙文的这个回答，是有准备承认以将“满洲”租借给日本为条件来交换日本提供资金援助的意思的。所以森恪又说：“万一日本方面决定订立满洲问题之密约，有立即提供资金予以援助之意，五日之内，一定速报阁下，阁下即可推迟和议、安抚军队、速赴日本吗？”孙文立刻重申自己的诺言：“那是当然，如能立刻获得贷款资金，余马上可着手稳定军队，而后即可登程”^{（11）}。

森恪把这次会谈的大致内容整理成中文，呈孙文、胡汉民审阅、修改后，就将其译成暗码，电告益田孝。孙文、森恪合作写成的这份电文内容如下：

“财政穷匮，支那年末以前如无一千五百万元则无法进行战争，革命政府将陷于混乱。汉冶萍公司五百万日元借款已成立，以招商局为担保之一千万元借款，亦正与日本邮船公司、英、法、美诸国交涉中，若五日内此项借款不能成立，则万事休矣，孙、黄将与袁世凯订立和议，将政权授于

袁氏。孙已同意租借满洲，彼提出之回答云，日本若能为防止革命之离散，在汉冶萍公司五百万日元之外再速速提供一千万日元借款，将中止与袁世凯之和议，孙本人或黄兴当赴日本订立关于满洲之秘密契约，但借款到手之前不敢擅离南京，因军队有散乱之虞也。四日之内若有断然实行满洲（问题）之意，请电示贷付一千万日元之意，当中止与袁世凯之和议。余因事明日将返回上海。森”⁽¹²⁾

2月3日孙文、森格会谈之后，孙文2月5日只催促森格打电话问日本方面的回答。所以森格在2月6日又发出一份电报：“与袁世凯之议和将延至9日，望在此之前给予确切答复”⁽¹⁴⁾。

从这个事件上看，孙文对于以租借“满洲”为条件与森格进行的借款交涉的态度是非常积极的。但是日本方面由于桂太郎一直未能说服井上馨等人，孙文急切盼望着的一千万日元的借款，结果也未能实现。

二、从“二次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孙文再度亡命日本，领导以推翻袁世凯政权为目的的“第三次革命”的准备工作。孙文为了获得军事上、财政上的援助，曾大量接触了日本军界，实业界及民间的人士。

1915年年底到1916年年初前后，孙文在中华革命党党员王统一的私宅中，与日本陆军总谋长上原勇作进行了极秘密的会谈。据说，孙文当时对上原提出，日本如果能提供至少三个师团的预备役官兵和武器援助中国革命，中国可以将“满洲”的特殊权益让给日本，承认日本的移民和开拓的优

先权：但是，“满洲”是中国的领土，主权属于中国⁽¹⁵⁾。

1916年6月袁世凯病死之后，北京政府的控制权转移到段祺瑞等北洋军阀手中。1917年孙文等革命派人士齐聚广东，8月组织了第一次广东军政府，中国出现了两北两个政府的对立。9月10日孙文就任广东军政府大元帅，9月15日，他会见了由犬养毅介绍来的美籍日本记者兼社会运动活动家河上清。

在与河上清的会谈中，孙文这样谈到了“满洲”问题：

“日本如果能够立刻借给我们数百万美元，并赠送几船武器，我们可以轻易地打败北京派（军阀）”。我一旦取得政权，也会主动地将“满洲”委托日本管理。”“当然，我们也想把满洲保持在自己手中，但是，满洲对于我们来说并不像对于你们日本人来说那样绝对必需，你们的人口在不断增加，所以我们认为给你们膨胀着的人口提供一个自由行动的范围是急迫而必要的”。中国还有南部亚洲，可以容纳自己膨胀的人口。不管过去还是现在，几千万的中国人跨海去了苏门答腊、爪哇、西里伯斯、婆罗洲、海峡殖民地（马来西亚）、法属印度支那、暹罗、缅甸等地，他们富裕了以后每年都向故乡寄回了几百万美金的钱款。“亚洲南部的这些广大地域，当然是亚洲人的地方，对于中国来说，也是比满洲更有大的希望和前途的地方。”

在这个对话中，孙文提出了“亚洲的复活”的提法，举起了“为了亚洲人的亚洲”的旗帜，与这些大亚洲主义式主张相辅并行的，是将来不得不将“满洲”置于日本控制之下的思想。这件事，反映出孙文在这一时期有着相当浓厚的大亚洲主义思想，而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已经最后成熟的日本帝国主义，他未必抱有足够的警惕，对于日本对华政策

的现状与前途，他依然持有相当乐观的看法。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1918年11月16日，孙文又接受了日本实业家松永安左卫门的访问。孙文向松永述说，中国现在的南北抗争是日本助长起来的，南方派与北方派的战争，就是和日本的战争；日本如果防止援助北方派，北方派就会自行灭亡；孙文等南方派，并不象北方派那样把“满蒙”看得十分必要，所以日本如果援助南方派，日本对“满蒙”的领有就可以得到承认⁽¹⁹⁾等等。

从辛亥革命爆发之前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孙文在“满洲”问题上，曾对日本提出了诸如承认租借权、出让特殊权益、允诺移民和开拓优先权、委任统治权直到承认对“满蒙”的领有权等各种各样的让步与妥协方案。孙文的这些方案，无一不是在革命运动面临极大的困难时，作为日本方面提供援助的交换条件而提出来的。

孙文的目标是中国革命的成功，为了达到革命派夺取政权的目的，他不惜一切可以采用的手段。他在很长一段时期里都采取了这种“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态度，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假设孙文从日本得到了援助，达到了建立革命派中央政府的目的，而为此丧失的主权也实在太多，代价太高了，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这对于中国全体国民的利益来说，也是一个极其危险的赌博。

三、1919年以后

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孙文对日本的态度发生了大的变化。6月，孙文把日本军部叫做帝国主义，公然对其开始了批判。这反映了孙文一反历来对日本的依存态度，开始向日

本（主要是日本人民）呼吁理解和支持中国方面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要求。这可以说是孙文反帝活动的一个转折：此后，孙文对“满洲”问题，也由1918年以前的妥协态度，转变为基本上的非妥协态度。

1921年11月召开的华盛顿会议上，孙文的广东政府方面12月7日也向与会列强各国代表团散发了要求内容，其中就有“废除有关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的中日条约及交换公文，将北满及南满各铁道归为中国的国有财产。”的条目。这是孙文已开始要求日本放弃在“满洲”既得权益的表现。

第三次广东政府时期的1923年5月，孙文在与来访的鹤见佑辅的谈话中又说道：日本过去二十年来的对华政策全部是失败的政策，日本只要不停止援助北京政府，不从“满洲”撤退，那就不管日本再怎样改变其政策，也难以消除中国人民的深深的疑惑⁽²¹⁾。

1924年11月，孙文北上途中在神户停留，11月25日、26日两天：他与日本民间右翼的巨头头山满进行了会谈。当时，头山曾质问孙文如何处理日本在“满蒙”的既得权益。孙文回答说，眼下并不会立即要求收回旅顺、大连，不考虑要求日本放弃在“满蒙”的既得权益，只是强烈地希望包括日本在内的各列强帮助中国收回关税自主权和领事裁判权两大主权⁽²²⁾。

数日后的11月29日，孙文又会见了在神户发行的英文日刊《日本编年史》（Japan Chronicle）的记者，表示“日本在满洲的既得权益就如同香港、澳门所处的地位，现在还不会要求其归还。但所有的列强都应遵照苏俄的先例，将主权交还中国，日本也不应受到与其他列强不同的特别优待。”

从以上所述的过程可以看出，1919年以后，孙文在“满洲”问题上，基本上不再表示出妥协态度。值得注意的是，孙文关于“满洲”问题态度的变化，与他反对帝国主义思想的基本形成时间上是一致的。即1919年6月以后，开始正面批判日本帝国主义，到了1921~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期间，就开始在公开的场合向帝国主义列强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了。

此外还可以指出的是，孙文关于“满洲”问题态度的变化，与他的大亚洲主义思想产生质变的时间也是重合的。可见，这两者之间也是密切联系着的。

四、结 语

孙文从革命运动早期到1918年前后，在“满洲”问题上对日本的态度之所以是相当妥协的，其原因大概有以下几点：第一，他判断，为了获得日本对中国革命的援助，必须在某种程度上满足日本帝国主义对“满洲”或者“满蒙”极强的统治野心；第二，他认为革命告成推翻清朝政府以后，中国并没有绝对的必要要保有“满洲”；第三，是他对形成过程中的日本帝国主义的认识十分不足，总是过低估计了日本帝国主义危险的侵略本性；第四，他还抱有一种乐观的看法与自信，以为“满洲”或“满蒙”即使一时置于日本的统治之下，将来革命成功革命派掌握统一的中央政权之后，也不难收回“满洲”的主权或统治权。

1918年以前孙文在“满洲”问题上对日本的妥协态度，与他当时的反对帝国主义的认识（以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主张为中心）尚不明确，尚未形成他的对外认识的核心有密切关联，同时又与他的大亚洲主义思想（以“黄白人种斗争观”

和“中日提携论”为中心)也有很深的联系,但1919年以后,孙文的反帝思想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他对日本帝国主义开始进行公开批判,另一方面,构成他的大亚洲主义思想基础的黄白人种斗争观和中日提携论也开始崩溃,导致他的大亚洲主义主张的质变。于是,孙文对“满洲”问题的态度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一变而为否认日本在“满洲”的权益,要求日本撤出“满洲”。

但是,日本朝野各方却顽强地维护日本在“满洲”的权益,作为一个现实问题,立即要求收回日本“满洲”的既得权益是极其困难的,孙文等人也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在1924年11月最后一次访问日本之际,孙文申明并不立刻要求日本归还在“满蒙”的既得权益。这正是鉴于日本方面对于维持“满洲”权益的狂热的精神状态,认为立即彻底解决“满洲”问题对中国来讲亦非得策,只有暂时作为悬案,今后慢慢地改变日本的舆论,留待将来予以解决这样一种判断下的结果。

注释:

(1)拙文《孙文与“满蒙”问题》,载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编:《国际政治》第28号《日本外交史诸问题I》(1964年7月)22—35页;中文译文载中国社会科学近代史研究所编:《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3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6月)148—164页。

(2)拙文《孙文与“满蒙”问题》22页。

(3)同(2)23页。

(4)山浦贯一:《森格》(高山书店,1943年)402—406页。

(5)内田良平:《硬石五拾年记——内田良平自传》(苇书房1973年)52页。

(6)同(5)。

(7)同(5)151页。

〈8〉《宗方小太郎文书》（东京大学明治新闻杂志文库收藏）。

〈9〉森格1912年2月8日致益田孝书简，三井文库收藏；《井上侯爵家提供文件》中所收。关于这些书简的全文介绍与解说，参见拙文《辛亥革命时期关于孙文的资料——围绕着“满洲”问题的森格书简》（亚洲经济研究所内部资料，1982年3月）1—21页。

〈10〉同〈9〉，16—18页。

〈11〉同〈9〉，19页。

〈12〉同〈9〉，20页。

〈13〉同〈9〉。

〈14〉同〈9〉，21页。

〈15〉山中峰太郎，《实果：亚细亚的曙光——第三次革命的真相》（文艺春秋新社1963年）285—29页。

〈16〉拙文《孙文的“亚洲主义”》，载辛亥革命研究会编，《中国近现代史论集——菊池贵晴先生追悼论集》（汲古书院1985年）413—438页。

〈17〉松永安左卫门，《支那我观》（实业之日本社1916年）122—126页。

〈18〉鹤见祐辅，《广东大本营的孙文》，《改造》1923年7月号，122—129页。

〈19〉《东京朝日新闻》1924年11月27日。头山满，《孙文、蒋介石、汪精卫》，《改造》1940年5月号。黑龙会编，《东亚先觉志士记传》下卷，1935年，796页。

〈20〉同〈18〉，421—438页。

附注：本文是根据我1986年11月5日至9日在广东中山召开的“孙中山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提交的论文又作了大幅度的订正、增补写成的，1987年12月28日脱稿。

（原载日本《关东学院大学文学部昭和62年度纪要》第52号，赵军、沈浩译）

试论孙文的经济思想

日本神戸学院大学教授 中村哲夫

“实业计划”（《建国方略第二·物质建设》）是孙文经济政策具体化的代表作。这个关于中国经济开发的计划并非纸上谈兵的空论。从人类经济学的观点看，它提出了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应有的发展方向。这就意味着在今天我们有必要就其包括经济思想在内的学术价值重新作一反思和探讨。对孙文的经济思想进行考查，首先得从研究经济学科内的各派学说史入手，这样方可对孙文的经济学说加以分析。

经济学说史这门学科是在经济学领域内所形成，其研究的对象是纯粹的经济学家们的著作。孙文绝对不是一位经济学家，所以他所著述的“实业计划”显然不是一本纯经济学的专著。因此，若用传统的经济学说史的概念去研究孙文的“实业计划”，显然是行不通的。但是若用经济学说的内容对中国经济的过去、今天和将来作一正确的分析的话，很显然也已脱离了自亚当·斯密以来的人类经济学说流派的范围。^{〔1〕}假如经济学准备以人类经济学的形式来恢复自己的权威的话，那么探究孙文的经济学说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课题。因为孙文经济学说的内容，就是探究中国经济在人类经济中的意义。当然，孙文尽管不是专门的经济学家，但他从实践的观点出发对人类经济学的真挚追求是不可否认的。

因此，本人拟首先将“实业计划”中有关经济学说的特点摘录出来。其次拟分析一下能对孙文经济学说得到明确理